

屈原“左徒”、“三闾大夫”新论

郑志强

提 要 屈原所任“左徒”一职,与当时中原各国所设“左司徒”一职相对应,大体相当于《周礼·地官司徒》中所设“小司徒”职级。屈原的“三闾大夫”为其封爵,而非行政职务,不可与“左徒”一职相混淆。屈原的“三闾大夫”非“上大夫”,应为“中大夫”级爵位。屈原“左徒”的行政职务曾被免去,但封爵到其投江自尽之前一直未被削夺。

关键词 屈原 左徒 三闾大夫 新论

在两千多年来的屈原研究中,关于屈原政治身份的“左徒”、“三闾大夫”究竟当作何确切诠释,学界一直聚讼纷纭,至今尚没有形成为大家所公认的统一认识。本文就此两个问题,试综合跨学科知识,采取逻辑归谬与排除法和“谁主张谁举证”这一民事诉讼中的原则提出自己的新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左徒”的正确诠释应当为“左司徒”

自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后,学界即对屈原所任“左徒”一职产生了诸多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游国恩据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认为“左徒盖今左右拾遗之类”;^①吴郁芳认为“左徒”为职掌宗庙、辅弼君王的祝宗卜史之人;^②林庚认为“左徒…侍从太子,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③王汝弼认为“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④姜亮夫认为左徒“盖近内官,其职颇与汉制太常相似”;^⑤汤漳平先生认为“左徒的职务仅次于令尹,也许就是令尹的副职”,“主要负责为国王提出有关内政外交的重要政策、制定法令”;^⑥黄崇浩先生认为:“屈原为怀王师”;^⑦裘锡圭、汤炳正认为“‘左徒’即‘左登徒的省称’。左登徒很可能是上大夫之职,虽兼管内政、外交,但主要活动在外交方面”;赵逵夫认为左徒“即中原国家

① 游国恩《屈原》,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页。

② 吴郁芳《“升徒”考》,《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③ 林庚《民族诗人屈原传·说“左徒”》,《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棠棣出版社1952年版。

④ 王汝弼《左徒考——屈赋发微之一》,《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1946年第2期。

⑤ 姜亮夫《楚辞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⑥ 汤漳平《屈原传》,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7页。

⑦ 黄崇浩《屈子阳秋》,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的‘行人’”；①路百占、段熙仲认为左徒即“左司徒的省称”，②但周建忠则不同意“左徒即左司徒的省称”说，并认为上述观点均不确切。周建忠先生的观点是“第一，‘左徒’为楚国官职，既见于文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见于青铜器铭文，有‘二重证据’；第二，‘左徒’就是‘左徒’”，与上述诸种诠释“没有关系”。③然而，问题又来了：若按周建忠先生的见解，屈原“左徒”一职似乎在同时代别国或后世没有基本相似的官职可以对应。如此这般，问题在两千多年间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原处，仍然未得到解决。

但是，问题总是应该得到解决为好。对于难解的古国官职，用同时代和后代相同或相类似的官职进行对应性诠释，有助于理解问题。同样，楚国屈原所任“左徒”一职，不可能成为同时代各国官职及后世官职均不能相对应的独一无二的官职；相反，它必然能够与其它国家更易于理解的职名大体相对应。

本文认为，屈原所任“左徒”一职之职名，确与“左司徒”一职对应无疑。其一，正如周建忠先生言，青铜器铭文中已发现“左徒”职名；而我国故宫所收藏的古官印中，亦有“左司徒”官印，④这枚官印据专家考证是齐国官印。“令”与“司”在那个时代均为“首长”之意，因而副职有时省而不用“司”或“令”是自然而然的。从屈原所生活的时代乃至稍前或稍后，我们发现战国时期的周王朝及齐国、韩国、楚国等国确有大司徒、司徒以及左徒、左司徒之职名，但均未发现任何国家同时分设“左徒”和“左司徒”的记载，因此应该排除“左徒”与“左司徒”是可以同时分设的两个性质不同的官职；另一方面，既然已证实当时楚国有令尹及其副职左尹、右尹、亦有大司马及其副职左司马、右司马，那么就没有理由排除“左徒”是“司徒”的副职。其二，“左徒”不可能是“令尹”的副职，因为根据现有楚国史料综合考察，“令尹”的法定副职为“左尹”、“右尹”。如《史记·项羽本纪》中言“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而班固《汉书》则明载项伯为“楚左令尹”；《史记·项羽本纪》中又明载“怀王”“以吕臣为司徒，以其父吕青为令尹”。可见令尹与司徒是两个不同的重臣职名。其三，当然“左徒”也不是“左右拾遗之类”的谏官，因为楚国另有谏官职名，为“箴尹”。其四，“左徒”与“怀王傅”、怀王“太子傅”不能划等号；若划等号，于史料无明确可信记载。况且《战国策》中明确记载当时的太子傅为“慎子”（即慎到）而不是屈原；另一方面，若屈原当过“怀王傅”，那怀王不可能只任屈原为“左徒”之职，更不可能因低级官员的一句谗言就“疏”、“绌”了自己的老师。战国时的楚国，如楚穆王之师潘崇、楚考烈王师春申君黄歇，封爵皆为“君”或“卿”（即楚国上大夫级爵）。若屈原果曾任怀王师，其封号至少当为“君”或“卿”而非“大夫”。其五，“左徒”亦不是“左史”，因楚另有“左史”一职。其六，“宗祝卜史”一类政治级别太低，《周礼·春官宗伯》明载“太卜，下大夫二人”。周王朝的“太卜”尚且只为下大夫，楚国的太卜爵级不会比周王朝的爵级更高，亦应在排除之列；且楚辞《卜居》中明言有屈原就卜于太卜郑詹尹一事，则“太卜”与左徒为分设职务不言自明。其七，“左徒”也不是“莫敖”。细考《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史籍，“莫

① 赵逵夫《屈原与他的时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3 页。

② 路百占《楚辞发微》（上卷），河南省镇平禹廷中学 1944 年石印本。

③ 周建忠《屈原仕履考》，《文学评论》2005 年第 2 期。

④ 方斌主编《故宫收藏·官印》，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8 页。

敖”本为楚国本土语职名,据曾广开先生考证,^①“莫敖”在《左传》凡四见,桓公十一年有莫敖屈瑕,庄公四年有莫敖屈重,襄公十五年有莫敖屈到,昭公五年有莫敖屈伸、屈生。《战国策·楚策一》有“威王问於莫敖子华”,可知莫敖为军事、外交方面的重臣,《左传》襄公十五年记载“楚公子午为令尹。公子罢戎为右尹。蔦子冯为大司马。公子囊师为右司马。公子成为左司马。屈到为莫敖。公子追舒为箴尹。屈荡为连尹。养由基为宫厩尹。”据此可知莫敖决非大司马的副职左、右司马,而是由屈氏世袭的类似“宗正卿”的职务,并主管楚国军队的精锐中军,亦可担任出征的主帅。

根据对《史记·楚世家》和《屈原贾生列传》及《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有关史料的综合记载考察来看,在屈原时代之前,楚国国王之下的主要大臣有五个:令尹、上柱国、太师、司马、典令。后仿中原官名,改“典令”为“司徒”。只不过从现有史料看,楚国当时对“大司徒”或“司徒”一职很少设;楚人尚左,多以其第一副职“左徒”代行其职事。但“左徒”的爵位与政治级别当低于大司徒或司徒,即“左徒”当为“中大夫”而非“上大夫”,这恰与《周礼·小司徒》中的职级与职责大体相当。因为按《周礼·地官司徒》规定“大司徒,卿一人。”此处的“卿”在楚国俗称“卿大夫”即上大夫,而“小司徒”正是“大司徒”的副职。至于“小司徒”职数级别,以《周礼·地官司徒》所记为“中大夫二人”;其职责《周礼》记载有“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乃颁比法于六乡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征令”,“施其职而平其政”,“小宾客,令野修道委积”,“大丧,帅邦役,治其政教”,“岁终,则考其属官之治成而诛赏,……正岁则帅其属而观教法之象”。这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等记载及《楚辞》中所包含的屈原史料,均是相吻合的。因此,认定屈原是中大夫级的“左司徒”大体不差,同时也解释了“上官大夫与之同列”并何以能“谗”屈原这些谜团。另外,在楚国上述这五个最主要官职中,时常有互相兼职现象,如楚穆王时潘崇以太师兼令尹,掌国事;楚惠王时叶公以令尹兼大司马平白公之乱;与屈原同时代的昭阳以楚柱国兼令尹而将兵,等等。由此分析,屈原当时以左徒官职兼大行人之事在当时的楚国并不稀罕。从《周礼·秋官司寇》中所载“大行人,中大夫二人”看,其官爵正与“左徒”相当,且查遍当时楚国史料,屈原任左徒时期确未见专设“大行人”之职。因此,《史记·楚世家》中的“屈原使从齐来”的记载,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左徒”即是“行人”;正确的理解应为屈原先前以左徒之职兼领大行人之职事,当时屈原的“左徒”之职虽被“绌”,但仍领大行人出使等职事。这从“顷襄王遣使于诸侯,复为从,欲以伐秦”以及《史记·秦申君列传》中“顷襄王以(黄)歇为辨,使于秦”、“楚使左徒侍太子于秦”等的记载看,当时楚国确未专设“大行人”一职,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临时“遣使”。屈原被“绌”了“左徒”,但仍领大行人之职事,爵级仍为中大夫。细绎史文记载,这一点当较为明确。

二 屈原的“三闾大夫”是封爵而非官职

关于屈原的“三闾大夫”,也是屈原研究中争议颇多并没有确切定论的一个难点。据目前的屈原研究史料看,最早也是最具影响的诠释,当属王逸的《楚辞章句》。他解释为:

^① 曾广开:《读书札记》(未刊本),“莫敖”条。

“三闾之职,掌王三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并认为“三闾大夫”是屈原任“左徒”之职前的“故官”。^①朱熹从王逸说云:“屈原名平,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②清代全祖望认为三闾大夫“盖公族大夫之职”,当代著名学者饶宗颐、姜亮夫、赵逵夫、周建忠等先生均同意此说。^③姜亮夫并进一步认为“三闾之职盖专守宗姓之事,而以教胄子为主”;^④还有学者如左东言认为“三闾大夫”即“楚以前的官职‘莫敖’的俗称,与同族的宗伯相近”;^⑤刘先枚也认为“莫敖即三闾大夫,官阶在卿位”;刘先枚甚至认为“楚国职官”有“莫敖”,其别称为“左徒”、“三闾大夫”,其“职掌”为“掌王族事务”。^⑥吴郁芳认为“屈原终身职在三闾”;^⑦周建忠先生认为“‘三闾大夫’与‘左徒’级别并不相当,‘左徒’当高于‘三闾大夫’”,“‘三闾大夫’之职,则与屈原政治生涯相始终”。^⑧综上所述,将屈原“三闾大夫”诠释为一种政治职务,甚至终其一生都担任这一政治职务的观点可谓源远流长。但这种诠释存在的一个内在逻辑漏洞却一直被忽略。这就是,假如“三闾大夫”真是政治性的“职掌”,那么在屈原任“三闾大夫”之前或之后,又有哪一个历史人物也曾任过“三闾大夫”这么一个政治职位?我们查遍《史记》、《春秋》三传、《国语》、《战国策》等相关可信史籍,均未发现任何人也曾任过“三闾大夫”之“职”。难道楚国为屈原一人专设了“三闾大夫”一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同理,如果“三闾大夫”是一个政治职务,那么“上官大夫”亦当是个政治职务。然而查过与当时楚国有关的可信史料,除靳尚之外,又有何人任过“上官大夫”一职?而“上官大夫”在当时楚国职官体系中所掌何事?有任何记载么?一点也没有;另一个重大漏洞是:假如作为一个政治职务的“三闾大夫”既与左徒、莫敖、宗伯、宗正、祝史、左史等行政职掌中的任何一个职务相等同,比如王逸的“掌昭屈景三族”、“教胄子”、“率其族属以厉国士”,请问,屈原“既放”离开朝廷达十余年之久,若以最短、也是最可信的记载,如《卜居》中有“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哀郢》中有“至今九年而不复”,那岂不等于说楚朝廷因“放”了屈原,屈原又带此职且不能履行政治责任,致使身为“公族”的“昭屈景”三族的“胄子”、“国士”无人掌管达三年乃至九年以上?这符合一个国家的政治逻辑吗?从《左传》中晋国、楚国等国家的确切史料看,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公族”子弟多数是要担任军职,特别是“中军”的各级重要军官和武士的。那么,在当时对外战争连年不断的楚国,允许不允许培养中军主力的高级教官离职达三年或九年以上?这当然是不会允许的。但作为封爵的“三闾大夫”就不同了,“大夫”在自己的封地中,固然有自己的行政管理职权,但封地另设有专门官吏管理,这在春秋战国是通行的规制。这种官吏一般官名为“家宰”、“家令”、“室老”或“家丞”等。比如最著名的一例:孔子被封为大夫后,他的学生原宪“为之宰”,这就是大夫的“家宰”。孔子对自己的封地想管多少就管多少,不想管就可以由原宪来管。相对于

①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2辑),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884页。

② [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页。

③ 参见詹安泰《屈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④ 姜亮夫《楚辞通故》(第2辑),第887页。

⑤ 左言东《楚国官职考》,《求索》,1982年第1期。

⑥ 刘先枚《楚官源流考索》,《江汉论坛》,1982年第8期。

⑦ 吴郁芳《屈原职业考》,《江汉论坛》,1984年第9期。

⑧ 周建忠《屈原仕履考》,《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屈原来讲,也应当是这样。因此,本文认为,将“三闾大夫”诠释为上述楚国的任何一个行政职务的观点,均是走进了岔道。事实上,在屈原时代,楚国政治结构中官、爵并行,这在《史记·楚世家》中是写得很明确的。如:“(怀王)六年,楚使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又移兵攻齐,齐王患之”,陈轸“即往见昭阳军中,曰:‘愿闻楚国之法,破军杀将者何以贵之?’昭阳曰:‘其官为上柱国,封上爵执珪’。”可见,在屈原时代楚国的政治结构中,官爵分而并行是很明瞭的。中国古代的贵族封爵制,不仅盛行于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仍颇为盛行。关于这一点,《史记·平准书》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汉兴,接秦之弊”,“孝惠高后时”,“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井税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焉,不领于天下之经费”。这进一步说明,贵族所“封”的“汤沐邑”是“皆各为私奉养”的,常态下属私有性质。它既然作为贵族的主要经济来源,一方面可以不再向中央领取货币形态的俸禄;另一方面,中央在一般情况下也是不得擅自剥夺这种“封地”或“采地”的。目前我国故宫收藏的“武遂大夫”印,经专家考证为战国时期韩国大夫印,印下文字申明“春秋战国时期由诸侯分封的贵族为大夫,享有封地,并掌管封地内的行政。”^①相对于屈原来讲,亦不例外。屈原的“三闾大夫”只能是他的“封爵”。“三闾”是封地之邑,而“大夫”则是与当时楚国贵族中王、公、侯、君(卿)、大夫、士六个大的爵级中的“大夫”级爵位。在当时的楚国,对贵族仍普遍实行“世卿世禄”制。屈原作为“屈氏”贵族的著名后代,他被封为“大夫”。在政治权力结构中,他的政治职务有升有降,在与楚怀王之间的关系上忽近忽远。虽然屈原所任的“左徒”职务到后来是被“绌”了,但他的封地和封爵“三闾大夫”却并没有被剥夺。说到底,屈原只是在一些具体政治问题上与楚怀王有“政见”的不同。细考屈原的政见,并非他一人孤立的见解,另外一些同时代的著名重臣如昭睢、陈轸等,均与屈原在不少政治见解上相一致;这一派的正确见解虽与楚怀王个人主见相左,但尚构不成“削爵”之罪。据本文考证,在楚怀王之时,屈原只是被怀王误解而“疏”,“左徒”之职一度“不复在位”,但“三闾大夫”的封爵封地并未被剥夺。到顷襄王和令尹子兰时期,也只是被“迁”了剩下的官职,但也并未被剥夺爵位。总之,在那个时代,封爵与官职既有对应的一面,又有可分离的一面。“封爵”主要体现的是阶级身份和政治经济地位,“官职”则是具体的行政职务。如此解释“三闾大夫”与“左徒”之关系,方为稳妥、妥贴。从这一点讲,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第一二七条“凡称某某大夫者,率以邑名”的见解,可作打开屈原“左徒”与“三闾大夫”之复杂关系的锁钥。而1999年常德市德山寨子一号楚墓出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的“鄂邑大夫𨾏(玺)”铜印,^②也为“凡称某某大夫者,率以邑名”提供了地下文物证据。按钱穆先生的见解,“三户亭,今河南淅川县西南,丹水之阳。楚起丹阳,其后疆境南廓,而名其故所起曰‘三户’者,指昭、屈、景三族。”^③3434此解将屈原的大夫封邑之处指定得较为明确;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发现,至今仍在持续发掘的淅川下寺大型楚国祖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及金文,已经并正在更充分证明此地即为楚国发祥地“丹阳”。

(作者通讯地址:郑志强 郑州 河南省社科院《中州学刊》杂志社 450002)

(责任编辑 晓 思)

① 方斌主编《故宫收藏·官印》,第34页。

② 政协湖南省汉寿县委员会主编《屈原与汉寿》2008年版,第4页。

③ 钱穆《史记地名考》(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572页。